

北京基督教 发展述略

BEIJING JIDUJIAO FAZHAN SHULUE

陈月清 刘明翰 著



目 录

(1) 导 言

- (1) 宗教的内涵与转型
- (3) 基督教的兴起和走向世界
- (7) 基督教在中华和北京的传播

(12) 第一章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与元代汗八里的“也里可温”

- (12) 一、景教在唐代之传入中国
- (26) 二、元代汗八里的“也里可温”

(44) 第二章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北京的传播和发展

- (45) 一、耶稣会与利玛窦来北京传教
- (58) 二、明末天主教会在北京和徐光启等
- (68) 三、汤若望与清初北京的天主教
- (79) 四、南怀仁及 17 世纪末北京天主教的重振
- (84) 五、“礼仪之争”和传教活动的衰落
- (99) 六、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历史作用

(102) 第三章 近代北京基督教的发展

- (102) 一、基督教第四次大规模传入中国
- (109) 二、基督教在北京的扩大传播
- (122) 三、义和团运动与洋教士的罪行

- (138) 四、北京基督教与“非基运动”
- (147) **第四章 传教士与北京教会的文教活动**
- (178) 一、传教士在北京的文化活动
- (165) 二、基督教会学校
- (173) 三、基督教会医院
- (176) 四、基督教与北京文化教育近代化
- (182) **第五章 东正教在北京**
- (183) 一、东正教的开始传入中国
- (189) 二、1840 年以前沙俄派驻北京的
历届俄罗斯正教传道团
- (194) 三、1840 年—1860 年俄国正教驻北
京传道团直接参与沙俄的侵华活动
- (200) 四、1861 年—1898 年俄国正教驻北京
传道团政策上的一些变化
- (204) 五、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
东正教在北京
- (211) **第六章 北京基督教的教堂及教徒生活习俗**
- (211) 一、教堂、教义和教规
- (220) 二、修会、差会和基督教青年会
- (224) 三、教徒的节日及生活习俗
- (227) **大事记**
- (241) **后 记**

宗教的内涵与转型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曾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庄严肃穆的殿堂、香烟缭绕的寺院、栩栩如生又形态各异的罗汉雕塑或使徒画像，以及虔诚不渝的皈依和祈祷，念念有词的颂经或悦耳动人又音调呆板的音乐……。谈起宗教来，许多人常常会泛起无尽的遐思。宗教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超人的、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的境界，主宰着社会和自然，因而对它信仰、膜拜或敬畏。

历史表明，人类最初时期并无宗教，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宗教的产生、衍化、传播和嬗变，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不同国家的国情都息息相关。宗教生活必然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影响。任何宗教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概不例外。

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人类进入文明历史以来，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从来没有过宗教信仰的。宗教信仰同阶级结构、民族习俗有关，但又并非等同。有全民族信奉同一宗教的，也有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的；同一个民族有的最初信奉一种宗教，后来却又改信了另一种宗教……

在对抗性的阶级社会里，宗教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甚至人们的心态、习俗……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所造成的苦难，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宗教一方面被统治阶级作为麻痹人民意

志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被压迫者对现实苦难的叹息和对未来的向往。人们有时在宗教领域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有时也能利用宗教展开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斗争。社会当中，上层和下层群众，有的所信宗教一致，也有的迥然有别。总之，大千世界里，宗教情况异样纷呈，各有特色。但是有一个基本点是相通的，即：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它历史地出现和传播，也将历史地最终消亡，它受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支配。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现象，属于文化范畴当中的一部分。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偶然因素能使人们膜拜和传播开来的。从宗教的变异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和民族发展的轨迹；从不同社会形态里宗教的转型，可以辨析出不同历史阶段宗教性质的必然变化。宗教的作用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人们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甚至绘画雕塑作品里，常常有着宗教的烙印。由于宗教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传播广、影响大，因而研究、评析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

怎样看待宗教？如何评析人们对宗教的膜拜、以及宗教的传播现象呢？这是一个十分现实、又非常敏感的可得重视的问题。

是否随着科学的普及、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宗教意识必然削弱呢？否！

很重要的例证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宗教徒的人数并未减少，反而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据美国《教会研究国际公报》1993年第1期中的统计，全世界5 575 954 000人中，佛教徒是334 002 000人、伊斯兰教徒为1 014 372 000人。而基督教徒则是1 869 751 000人，占全世界总人口的33.5%，亦即大约每3个人中有一个是基督徒。有些国家教徒众多，如印度的印度教徒计7亿多人。全世界无神论者和无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据不完全的统计，仅11亿人左右，只约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

宗教的历史作用如何？它一向都是起坏作用吗？对此，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经常利用宗教去

欺骗和麻痹人民，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确有官方宗教维护剥削制度。但是，对它还应全面、具体地评析。例如，中世纪初期基督教曾促进了西欧封建制的形成，伊斯兰教推动过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宗教和教会既束缚过文化的正常启动，也保存过文化遗产。对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同宗教确曾起过的衍射作用，切不可抹煞或低估。社会经济形态有过曲折和转型过程，宗教当然也有衍射和转型问题。不同历史阶段中，因宗教的传播渠道有别，其作用不同则是必然的。

基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人们的宗教观从来有别。有人把宗教视为神灵启示而不可侵犯；也有人把宗教看成迷信荒诞而不愿沾上。宗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吗？仅仅是虚幻的观念吗？否！各个宗教都有固定的经典、组织团体和不同的教义、学说，每个宗教都有专职的教务人员、教阶体制和专门节日，也都有聚集的场所、仪式和信仰，特别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典籍汗牛充栋，用唯物史观和正确视角对宗教加以剖析，开展研究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由于宗教信仰有着跨阶级、跨国别的背景，有着与民族、政治经常交织在一起的特点，每个宗教的教义信条、神学理论和礼仪习俗以及宗教组织的形式互异，不同教派林立，各执一说。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的过渡时期，宗教亦处于转型阶段。例如在基督教中，天主教与新教有别，新教中还有路德教、加尔文教和安立甘教等的区分，不同教派的阶级性有异，作用亦不同。因此，对待宗教问题必须运用复杂辩证的思维和审慎的逻辑方法。

基督教的兴起和走向世界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是奉耶稣为救世主的各个教派的总称。它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方正教及其它一些较小的教派，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逐渐流传到罗马帝国所属的欧洲和北非以及世界各地。

基督教最初是犹太教中的一个下层派别，其信徒多是贫苦人民和奴隶。他们反对罗马暴政，反对残酷剥削，具有平等平均思想。信仰上帝（天主）是人类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们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难，只有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督才能获救；认为人们一方面要忍受人间痛苦，争取死后进天国；另一方面深感无力改变现状，而寄希望于基督再临世上，以便伸张正义。

早期基督教承袭了犹太教的“至高一神”、“救世主”的观念，但对犹太教有所超越和变化。主张：第一，上帝惠顾一切人类，打破了犹太教中“选民”说的狭隘性；第二，信仰依靠基督教赎的“因信得救”说，弘扬耶稣的人格魅力；第三，简化了犹太教的繁琐仪式；第四，提倡虔诚、克己和博爱，反对冷酷、报复和自私，从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支持。早期基督教会的特点是：1. 尚无本身独立的教义和经典；2. 礼仪简单，只行洗礼和圣餐礼，提倡禁欲清苦和捐献济贫；3. 组织形式简单，活动地点不定，尚无教堂。公推管理人，2 世纪以后才建立主教制。

公元 2 世纪、3 世纪后，随着有产阶层加入基督教和取得领导权，基督教渐失被压迫者宗教的性质，而逐渐转变为剥削阶级的工具，竭力博取、顺从统治者。与此同时，基督教创立了以神学信条为核心的基本教义，主要信条是：“创世说”、“原罪和救赎论”、“上帝三位一体说”、“天国地狱说”、“灵魂不灭与世界末日说”。基督教的基本经典是《圣经》，即《新旧约全书》，包括《旧约全书》（继承犹太教经典，含《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部分，39 卷）和《新约全书》（含《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共 27 卷）。

公元 3 世纪末和 4 世纪初，罗马帝国迫于内外交困，对基督教的政策也从迫害逐步改变为利用，通过《宽容敕令》、《米兰敕令》的颁布和《尼西亚信经》的形成，最后在公元 392 年，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地位最终确立，教会体制和教阶制度亦逐

渐形成。

由于政治、经济的矛盾、行政区划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基督教在发展、传播过程中，曾衍生为西、东两大派系。西派教会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在中国称天主教），保留了较多的罗马文化传统，通用拉丁语，故习惯上称为拉丁教会。公元4世纪和5世纪时，主要传播于罗马帝国西部，即意大利，法国、北非迦太基一带及其以西地区。东派教会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正统教会意，亦称东正教），保留了较多的希腊文化传统，通行希腊语，又称为希腊教会，据有马其顿、希腊半岛至埃及以及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东西两派教会之间长期有着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及斗争，对教会的活动影响至大。

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后，欧洲由奴隶制社会过渡为封建制社会，基督教会亦随之从为奴隶主服务，转型成为封建社会的支柱。欧洲中世纪时，基督教占统治地位，教会本身是最大的封建主，把意识形态置于神学的统治之下。他们依靠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利用“异端法庭”（“宗教裁判所”）等等机构，残酷镇压进步事业和人民群众。在中世纪，一部分贫苦的农民、平民和市民也经常利用基督教异端教派的各种形式作为旗帜，发动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在基督教会发展的过程中，西欧罗马教皇制确立起来，并与世俗王权进行了长期的“政教之争”。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再未能整合统一。以后，东西教会各自形成了本身的宗教体系。

天主教的历史上，在内部出现了众多的修道院和不同类型的修会（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他们或隐修于修道院之中；或以“托钵”形式深入民间活动；或远赴海外传教。这些修会的共同特点是：1. 经教皇批准，受罗马教廷控制；2. 有各自的组织、会规和任务；3. 培养专门的神职人员，为各教区、教堂提供神父、主教；4. 兴办慈善福利和文化教育事业。各修会及传教士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度中（包括中国），产生过不同的历史作

用。

自1517年起，在德国首先爆发了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继而瑞士、法、英等欧洲各国也出现了反对罗马教皇专制统治的宗教改革。在欧洲陆续产生了脱离天主教的路德教、加尔文教等“新教”。而天主教在反对新教宗教改革运动中也产生了维护天主教宗旨的耶稣会，同时也巩固和改进了各个修会的组织与活动，尤其是向欧洲以外的传教。基督新教伴随资产阶级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成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

进入近代以后，基督教不论新教或旧教，都面临变化和转型，它从欧洲进一步广泛面向世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统治人民以及推行殖民扩张的侵略工具。旧教（天主教）和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都相应地作了调整。基督新教否认教皇权威，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体制，实行廉俭的礼仪，主张圣经是信仰的准则，制度较灵活，组织较民主。基督新教自形成以来，虽然宗派林立，种类繁多，但六大宗派是主流宗派。即：1. 路德宗（信义宗）；2. 加尔文宗（长老宗、归正宗）；3. 安立甘宗（圣公宗）；4. 公理宗；5. 浸礼宗；6. 卫斯理宗（循道宗）。

现当代以来，基督教的嬗变有着新趋势和新特点。这就是：1. 基督教的日趋世俗化和现实主义。随着当代经济与科技大潮的兴起，基督教的意识、行为和价值取向亦有明显衍变。从传统的定位观念转向适应世俗化，在神学理论上，从向往未来天国转移到追求现实，人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彼岸的善恶赏罚，而是现世的利害苦乐。2. 基督教传教手段的现代化。例如，灵活选定布道场所，宗教活动中结合科普知识的传授，影视歌舞的穿插以及医药生活咨询的安排，注意了生动活泼性。3. 基督教参政议政倾向加强。二战后，各国许多宗教名义的政党相继成立，或在野或执政，其政治要求与宗教利益常交织在一起。4. 基督教领域的多元化。随着世界政治结构多中心的形成，基督教的各种思潮、学说和流派日益增多，教派组织林立各地，例如迄今仅基督新教便有90多个

宗派，近 2 万个独立的教会团体，且不限于欧美，在广大亚非拉地区基督教传播甚广，教徒亦日增。

基督教在中华和北京的传播

基督教在中国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基督教自唐朝以来，曾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传教的主要目标是唐都长安（西安）；第二、三次的主要目标都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的首都北京。第四次，北京仍是传教的重点城市之一。

基督教各派中最先传入中国的一个支派是聂斯托利派。时间是公元 635 年（唐贞观九年）。聂斯托利派原属东方基督教会，因与尼西亚正统观点相抵触，而被宣布为“异端”，后由波斯经西域来到中国长安传教。因逢唐代盛世，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从而打开局面，被称为“景教”，在唐朝共传播 210 年。因 845 年，唐武宗下诏灭佛，景教同时被禁。这段历史从 1625 年发掘出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实物碑铭得到证实。第一次传入中国虽时间不算短，又在近百座城镇中建有景教寺，但地区局限于长安、洛阳、当时的两京及陕、川和扬州以南，因受佛、道两教的排挤，传播的规模和进展均不大。

第二次传入是在元代的 13 世纪。在中国中断了 400 年之久的基督教，有两支来华。一支是继续流传于中亚、蒙古诸地的唐代通称的景教；另一支是罗马天主教会遣华传教的方济各会教士，都向大都（北京）汇集而来。元朝蒙古人统称其为“也里可温教”（亦称“阿勒可温”或“十字教”，意为“长老”，“有福缘之人”，乃尊称）。因蒙元采取“一视同仁，皆为我用”的政策，甚至对传入的基督教常特降诏免租税、除徭役，因而元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均超过唐代。

由于在元代，天主教和聂斯托利派双方互相攻讦，矛盾重重，更加上 1368 年元朝灭亡，基督教依附于蒙元政治，教徒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在汉人中很少传播，因而基督教在中国没有扎下

根，当时对中国文化没有多大影响，故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再次中断。

第三次传入是明末清初。中国虽然处于明清王朝更迭、改朝换代的非常时期，但基督教的活动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更向纵深发展，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

1582年，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先后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他们以北京为中心，都是传教的中坚。他们在北京受到中国皇帝优宠，有官衔、居高位，使传教获得空前的成功。这段时间里传教活动的特点是：1. 利用了有利的时机。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上层建筑日趋腐朽，宋明理学不断受到抨击，佛教、道教已呈衰败枯萎之势，为基督教的传入提供了有利的环境；2. 采用了“入乡随俗”方针，教士们提出“耶儒合流互补论”，他们穿儒服，说汉语，诵诗文，将天主教义与孔孟之道相融合；3. 依靠皇帝，结交宫廷并以向达官贵人传教交友为重点，得到了中国一批官员教友的鼎力支持和誓死庇护；4. 用准确修历为媒介，以介绍科学知识为手段，以督造枪炮为特长，博得朝野的验证和信任，扩大了天主教在华的影响。

在清朝的准许和优惠下，东正教第一届传教士团于1716年抵北京。俄国正教驻北京传道团长期实际是沙俄驻北京的外交机构。东正教传教士的官方身份是天主教教士们所不具有的。

基督教第四次大规模传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是从1807年英国伦敦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教士马礼逊抵达中国开始的，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前。继马礼逊之后，英、美、俄、德、法……等国各个教派的传教士陆续来华。这次传教的特点是：1. 基督教传播与殖民侵略结合，同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同步进行；2. 传教士在各侵华国家的政府直接支持下，以炮舰和不平等条约为依托，不限于传播宗教，而且肆意干涉中国内政，欺压中国人民；3. 基督教传教活动以北京等地为传播重点，规模大、教派多，高潮持续时间长。基督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各差会都

派大批教士来华。基督教会势力显著膨胀，基督徒人数激增；4. 基督教的侵华活动同中国人民大众的反侵略斗争，教会、教士、教民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教案迭起，一些反洋教的斗争具有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5. 20 世纪以来，基督教和教会一方面“一手捧圣经、一手捧四书”加紧进行中国化的传教活动；另一方面积极筹办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传播科技，以之作为间接传教的活动方式。一些教会主办的大学和医院，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

基督教在北京的传播过程，便是北京城一些人们对十字架的膜拜过程。对基督教和来华传教士应当历史地具体剖析。

首先，明末清初一些传教士从西洋不远数万里来北京传教，当然他们是因忠诚于教会的事业心所驱动，忍辱含辛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人同帝国主义阶段来华的传教士是有明显区别的。19 世纪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因政治和文化背景复杂，不应笼统而论。极少数人热衷于侵略，他们手上确实沾有中国人民的鲜血；多数教士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过殖民活动；也有一些教士对中国人并无敌意，仅执着于传教。不少教士在传播西方文化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其次，要辩证地评论基督教在北京的功能和作用。基督教本身提倡的忍耐、苦修和服从，以及它的社会整合功能，曾维护了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上半叶旧北京、旧秩序的稳定，这一点毋庸置疑是消极的。但基督教的文化功能具有双重性。即：一方面曾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包容性和摄取性所形成的综合文化，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对人类文化宝库有着巨大贡献。北京的基督教文化有过许多建树和宝贵遗产。

最后，应当指出：旧中国、旧北京曾是基督教外国差会最大的传教区之一。由于组织上、经济上依附于外国各差会，因而中国基督徒受“洋教”的奴化思想确实较深，不能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在旧北京，基督教会的自立和“本色化”难以实现。但是，

中国基督徒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爱国传统和民族观念，这些是中国的国情，是中国基督徒的可贵的政治品质。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从此以后，为中国和北京的基督教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的著名人士吴耀宗等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重要宣言。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破坏，宣言中号召各基督教会和全体教徒，拥护我国的《共同纲领》，投入建设祖国，并庄严地宣布了中国基督教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方针。北京的基督教徒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了建设一个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并积极投入了各项政治活动。1950年10月，北京基督教界成立了北京市基督教抗美援朝分会。1953年5月该分会撤销的同时，新成立了北京市基督教三自革新学习委员会。该会组织北京市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学习时事政治和开展工作。自1956年起，北京市基督教各派别逐渐实现联合，根据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章程，由北京市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统一管理并协调各派的经济、教产、人事以及各项活动。北京市基督教界随中国基督教代表团于1961年出席过世界基督教和平大会。1965年出版过《北京市基督教史料选辑》，记述了北京市基督教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史实。此外，还印发过一些参考资料，交流信息。“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基督教会的宗教活动全部被迫停止。

1979年3月后，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恢复工作，先后举办过一系列活动和会议，并定期召开各届代表会议。各基督教堂陆续修缮和开放，并接待外国基督教徒参加宗教活动。根据政府的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北京市的基督教既自主地恢复和开展宗教活动，又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十几年来，新成立了基督教的神学院，也增加了一些教堂，年轻的神职人员有所扩大，宗教事业后继有人。

宗教工作任重道远。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目前北京市基督

教正在开创宗教工作的新局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要研讨和阐述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基督教会在北京发展史的要略。

第一章

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与 元代汗八里的“也里可温”

在本书导言中曾述及过，基督教传入中华已有 1360 多年，自中国唐朝起，先后传入中国共历四次。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及各种宗教的互相影响，以及彼此消长、衍变的关系，曾为国人所瞩目。但记述情况和传说纷纭。必须以史料为根据，以史实为准绳详加论证。

一、景教在唐代之传入中国

关于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记录，在公元 3 世纪时阿诺皮乌斯曾撰文叙述过，他称教会之成就，不论“在印度，在‘丝国’”人、波斯人或在阿拉伯、埃及、叙利亚及马其顿人中，……在每一岛每一省，凡日出日没，光芒所及之地皆是”，又写道：“虽人人皆受罗马王之艺术及迷信习俗之影响，但不加迟疑，立奉基督之真理，而摒弃其固有之一切。”^① 这里所谓的基督福音早在 3 世纪已传入中国并无证据，仅是一种想当然的传说而已。

再者，关于耶稣圣徒圣·多默曾亲到中国传过教之说，并不可靠，亦乃传闻。

^① 原载《阿诺皮乌斯反异教论集》八卷，1542 年罗马版，转引自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册，岳麓书社 1987 年版第 412 页。

根据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基督教史学家阿·克里斯托芬·穆尔的考证和论析，以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原碑文的重要物证，公元635年景教开始传入中国之说，可作为基督教首次来华之可靠的记载。

景教，原名聶斯托利派，是聶斯托利所创。此即狭义的景教。中国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皆自称为“景教后学”。

聶斯托利（380年—451年），生于叙利亚，原为安条克城修道院院长，428年—431年任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对耶稣本人是神还是人的问题发表过个人的见解。他主张“道成肉身”的耶稣，具有真正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神性和人性在他身上的统一，乃精神上的统一，并非物体上的统一。他认为童贞女玛利亚是耶稣的人身之母，并非“上帝之母”。具体说来，即：耶稣是玛利亚生的普通的人，以后才开始“道”与人结合，才成为神的。431年，在以弗所^①宗教会议上，他受到亚历山大主教西里等人的谴责。聶斯托利的学说被论敌斥为“双重位格”论，即基督二性分立论。在宗教大会上，他被判为“异端”，旋被开除教籍，遭到放逐。聶斯托利的观点，同当时东方教会中许多神学家的观点相仿，但为西方教会所不容。此后，聶斯托利及他的追随者被迫逃往波斯，同那里早在424年已脱离拜占廷教会而存在的古代东方教会相结合。于484年建立起独立的东方教会。这一新教会便称之为聶斯托利派。4年后，聶斯托利本人虽去世，但此教派在波斯因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优待而长期存在。教士们作为教师和医生而地位较高，长期活跃于波斯宫廷并向外传教。540年，东方教会进行改革后，传教活动进一步扩大。他们的传教士从两河流域向东远达印度和中国新疆等地。在7世纪中叶的635年，此派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称之为景教。

① 小亚爱琴海边城市。

（一）现存于中国的唐宋景教之文献

直至17世纪以前，关于基督教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人们并不很明确。1625年（明朝熹宗天启五年）3月初，在陕西西安城西南的盩厔县（今陕西周至县）出土了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碑文中人们知道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确在635年（唐贞观九年）来到中国。景教碑是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阴历正月初七日（阳历2月4日）所立。根据此碑及有关史料可以清楚地了解635年—781年期间景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此碑是基督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最重要最有力的物证。

此黑色石碑，大体完好，刻字清晰，初出土时移立到西安距西安门外大街约5里之崇仁寺内，1907年10月2日移到西安南门内的碑林（现为陕西省博物馆）之内。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重约2吨。碑头上端刻有飞云和莲花烘托着的一个十字架，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名“螭”，左右配有百合花。碑的正面刻有32行（每行62个）汉字，正书，总共1780个字。碑背面无字。碑下面和左右两侧都有用叙利亚文刻的1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称。这些人名，除8人外，都是叙利亚文和汉文相对照，据碑文记载，碑文作者乃大秦寺僧景净，刻写人是吕秀岩。碑文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序文较长，第二部分是颂词。碑文中简略地叙述了景教的基本信仰，然后较详地记述了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带经典抵长安后，受到唐太宗以下六代皇帝优遇的经过。颂词是用韵文表述的。

景教碑出土后近300年，在甘肃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又发现了有关唐朝景教经文等重要文献。计有：

1.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写本，共309字。“三威”乃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严上帝，“蒙度”是得到救赎之意。译自叙利亚文，全经分为“赞文”、“尊经”、“按语”三个部分。“尊经”在天主“三威”之后列举了31位法王（圣徒）的名字，分